

纪念袁复礼教授百年诞辰

王恒升^①

(中国地质科学院)

光阴荏苒，袁复礼教授百年诞辰即将来临。他的音容笑貌，依稀浮上脑际。桩桩往事，历历宛如昨日。

我最早认识袁复礼先生，大约在 70 年前。那时我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念书，常见一位校外来的兼课先生。我们虽未直接听他讲课，但他在走廊里、庭院中、见到我们这些学地质的学生仍亲切招呼，热情攀谈。他也操一口河北腔。后来，听人们说，他是留美硕士、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技士，叫袁复礼，教本系一年级同学的普通地质学课。他出身书香世家，是河北徐水县人，原来我们还是大同乡。

1939 年，我应聘去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担任岩石学教授。从那时起，与袁复礼教授共事 4 年多。我当时是最年轻的教授，袁先生长我 8 岁，他总象老师和兄长那样待我。他为人忠厚，心胸开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平时总是面带微笑。他尊重同事，爱护学生，更深深地热爱祖国。他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受益匪浅，我也深受启发。

那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一帮腐败官僚，常克扣我们教职员工的工资，他们挪用公款(包括工资款)去做生意，放高利贷，发国难财，而不顾教职员工死活。每月工资本该月初一、二日就发，他们往往拖欠至下旬，有时甚至拖到下月。在物价飞涨的情势下，本来就微薄的月工资到手时往往连一袋面粉也买不到了，大家生活难以为继，这就逼得师生们经常愤怒地抗议。教育部当局为缓和矛盾，又要出新的花招，声称要给教授发“救济粮”。我们大家一议论，都认为当局只须把我们该得的工资如时如数发给我们就行了，犯不上再对我们施舍什么“救济粮”。我们大家一起合计，便写出了拒绝接受“救济粮”的声明。袁复礼教授最先带头签了名，我们大家深深受其启发、影响，都接着在上面签名。袁先生子女较多，生活当然要艰难得多，但他却更具有不吃“嗟来之食”的硬骨头精神，这正是我们中国的脊梁。

1943 年，我接到经济部长翁文灏先生关于组建新疆省地质调查所的指示。回想 10 多年前我早就听说过袁复礼教授与徐炳昶、斯文赫定等共同率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绥、宁、甘、新等省艰苦奋斗的事迹，特别是袁先生在新疆作过很多工作，取得很大成就。他为科学事业英勇拚搏的精神深深感动和鼓舞着我，于是，我于 1944

^①王恒升：学部委员、教授，岩石学，曾任新疆地质调查所所长、地矿部地质研究所岩石室主任、中国地质学会岩石专业委员会主任。

年携带家属，率领一批年轻的地质工作者，踏上漫长的征途，“西出阳关”，去到遥远而陌生的边疆，在那里工作了将近 10 年。

1956 年，我调回北京。不久听说袁复礼教授的女儿袁扬，在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成了我国最早一批女登山运动员之一，并征服了新疆境内的慕士塔格峰，8 人集体打破世界女子登山记录。我不由得回想起 10 多年前在昆明袁老身边那位健康活泼、聪明伶俐的小姑娘，也由衷佩服袁老教育子女有方。

1978 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我们地质界的许多老人幸福地会见了，我与袁老也久久地握手言欢，大家回忆起半个多世纪中国地质事业的沧桑巨变，也深深地为“科学的春天”之到来而欢欣鼓舞，决心为祖国地质科学现代化而鞠躬尽瘁，不遗余力。

1987 年，袁老不幸逝世时，我正因病住院。家人接到袁老治丧委员会讣告时，因为怕我过分悲痛影响治疗而没有告诉我，也未能让我去参加遗体告别。我出院以后，方知袁老噩耗，不胜痛惜。回想袁老光辉的一生，堪为地质教育界的楷模，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今天纪念他百年诞辰，就要发扬他的崇高精神，开创我国地质科学事业崭新的局面。

(此文由王恒升先生口述，其二女儿王莹棣记录，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委员潘云唐进一步采访，并整理撰写成初稿，最后经王老父女审校定稿)

学习袁老的优秀品德和优良作风

尹赞勋^①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今天我以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参加袁老夫子的 90 寿辰庆祝会，我首先向袁老师表示真诚的敬意！我们都是搞地质科学的，搞科学的人，总是对贡献最多、研究范围最广、工作时间最长的老先生表示崇敬，袁老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人，我和到会同志一样以十分尊敬的心情向袁老表示祝贺！

我与袁老认识 50 年了，在我认识袁老时，他已经工作 10 来年了，所以他是我的老前辈，我们是亦师亦友的朋友和师徒关系，今天和各位同志一样的心情来庆贺袁老 90 寿辰。袁老在研究工作上还给我很多帮助，今天我只讲一个具体例子。袁老 50 年前，从西北考察带回的许多标本中选一块很好的上古生代菊石化石让我研究，告诉我地质情况，在野外如何采的，研究时要注意什么。所以，袁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得过他很多教育，很多益处，所以今天一定要来参加袁老的庆祝会。

章鸿钊老先生是地质界的创始人，从事地质工作的时间比袁老更早一些。章老先生的在业学生，提起他都说章老先生、章老夫子怎么样，中国地质界，对权威大、作风好、道德也好的老师是很可以值得骄傲的，所以我一开头就称袁老师、袁老夫子。我们地质界很幸运的是，在开创地质事业的老前辈中一辈一辈的都有德高望重、学问又深又广的学者作为地质事业的开创人。袁老夫子还参加开创了地质学会，创始会员除了你以外现在还有没有别人？（袁：还有朱庭祜）就剩这么两位了，袁老比朱老大两岁。向他学习，会更加激起我们以敬佩的心情为四化出力，他的业绩卓著，我们要以袁老先生过去 60 多年中对我国的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来激励自己，为祖国多作贡献。

有些同志留恋城市工作，袁老先生一再强调野外工作非常必要。我所在的单位有的同志说，1 年最少在野外工作 3 个月，我当时说：最少半年。能跑的时候不跑，老了想跑也不行了，象我现在走都困难了。袁老夫子年轻时一出去不是 1 年 3 个月，也不是 1 年 5 个月，而是长年在野外，一出去就是好几年，所以，袁老先生，不光学问好，道德好，作风也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不留恋长期住北京，而是长期在野外艰苦工作。因为那里化石非常丰富，古脊椎动物很丰富，各门类古动物很丰富。他采来的满箱满筐化石给我看过，当时我印象很深。他自采自修，他给我那个菊石化石就

^①尹赞勋：学部委员、教授，地质学、地层古生物学，曾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

是他修理了认为内部构造保存最好的，所以给我研究。无脊椎动物很多，大的脊椎动物也很多，有三台龙、天山龙、阔口龙……等大化石。他采集化石的方法也给我们很多启发教育。听说在新疆采集时，最热在火焰山附近，最冷在北疆。他在有恐龙化石的地方搭起帐篷，在冰上浇上开水再采化石，当时听见这种作法我佩服得不得了。外国人采大恐龙化石也想了一些办法，但象袁老发明的办法，不仅中国没有，外国我也没有听说过。创造性，作风之好，我非常佩服。

他采的化石各个门类都有，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几条大恐龙。他的工作不限于地质。他工作时间长，兴趣也广，许多门类都有成就，除此以外，在其他方面还有成就。地质学，最新的是第四纪，他对第四纪的各个方面都有研究。从西北到华北到西南，全国东西南北他都去过。历史和地质之间的交叉学科是考古，他也有贡献；对地理、地貌也有贡献。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值得我们佩服。

袁先生回国 10 年后，我于 1931 年回国。袁先生回国后，曾受到一些歧视，因此他在工作上没有得到应有的便利，而在这种条件不很顺利的情况下奋斗，得到这样的成绩，尤其值得我们佩服，因此，我对袁老的成就非常佩服。下面我读一首诗向袁老表示祝贺。

先生有道树新风，	刻苦学习业务通。
弱冠清华迎秀士，	放洋北美进学宫。
荣膺硕士回国内，	创立团体建会功。
五载西域行旅广，	化石巨细百箱中。
地质宗师历六十，	清华以后校联时。
新型学院生徒广，	遍布全国典范施。
科技起飞增产量，	工农效益供穿吃。
宾朋聚祝九十寿，	各地高足拜业师。

最后祝袁老健康长寿，为国家继续培养人才。

(1982 年 12 月 25 日在袁老 90 诞辰庆祝会上发言，杨光荣据录音整理)

袁复礼先生的历史功绩永存

——黄汲清先生赋诗赞袁老^①

1993年4月3日，杨遵仪、王鸿祯教授等到黄汲清先生家，请他担任纪念袁复礼教授诞辰100周年组织委员会顾问，并为袁老题词。黄老虽已年近九旬，并刚患过感冒，身体欠佳，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于是翻开10年前的一张彩照——黄老在祝贺袁老90诞辰会上，以茶代酒，举杯咏颂他写的诗句：“祝师长寿敬一盅”，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两位老人开心的笑脸，留下了难忘的珍贵镜头。我们请黄老题词的内容就是他在1982年12月25日贺袁老90大寿的这首七言诗：

华北考古收获丰，	河西调查展雄风。
蒙新五年历艰苦，	龙骨千块立大功。
袁氏珊瑚传后世，	水龙二齿南北通。
喜看桃李满天下，	祝师长寿敬一盅。

黄老谦虚地征求杨、王二位老师的意见：我重抄这一首打油诗行不行？两位老师异口同声地说：这首诗写得太好了，写出了袁老的主要贡献和大家对袁老的崇敬之情。望着三位老人亲切交谈的动人场面，我不禁想起10年前黄老在庆祝袁老90寿辰会上讲过的话。

他说：今天是个好日子，一个是袁老90大寿，地质界满90的袁老是头一个；从事教学工作60周年的，在地质界也没有第二个，所以，这个纪念会是不寻常的，我参加这个会非常高兴，感到很光荣。黄老高声念了他写的诗，然后解释道：袁老师在华北跑了很多省，作出了很多成果，特别是和安特生一起，发现了著名的“仰韶文化”，为考古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后来他到甘肃河西地区进行调查，发现了很多化石，首次确定了我国有早石炭世晚期地层，袁氏珊瑚是他第一次找到的，经俞建章教授定名，后来在广西、贵州又找到。臭牛沟煤田也是他第一次发现的。他当年写的报告我看过，我是步他的后尘，1941年去西北考察的。蒙新5年，是他一生中最得意、最重要的经历，历经千辛万苦，很不容易，特别是发现“龙骨”（爬行动物化石）不止千块，可能有上万块。水龙兽、二齿兽是袁老师第一次发现的，经研究，南非有，北美有，冈瓦纳大陆也有，所以我写了“水龙二齿南北通”。今天在座的，几乎都是袁

^①黄汲清：学部委员、教授，地质学、大地构造学，曾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

老师的学生，他的学生遍及海内外，真是桃李满天下，我今天以茶代酒，“祝师长寿敬一盅”。黄老的讲话，激起大家热烈的掌声。最后，黄老以理事长的身份，代表中国地质学会向袁老送了两份珍贵的礼物，一份是纪念中国地质学会成立 60 周年的文献，一份是袁氏珊瑚化石，贴在磨光的大理石上，上写着：祝贺袁复礼教授 90 寿辰。黄老高声朗读后，袁老笑声不止，激动地将袁氏珊瑚给大家传观。

黄老与袁老，交往数十年，早在 20 年代中期，黄先生就与袁老师在北大相识，聆听过袁老讲授的地文学。1927 年 5 月，黄先生在北大地质系上三年级时，李四光先生带他班上几位同学赴内蒙实习，就和西北科学考察团同车前往。袁先生虽因事晚走两天而未与黄先生同行，但他对袁先生和丁道衡先生的西北之行一直十分关注，曾为他们在考察中获得的重大成果欢欣鼓舞，并决心一定要到大西北去。后来黄先生在西北获得了许多开拓性的重要成果，共同的追求和共同的事业，使他们成了莫逆之交。1946 年，黄汲清先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三十年来之中国地质学”一文中，多次提到了袁先生对中国地质事业和地质教育的贡献。特别是对袁先生在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取得的成就给以高度评价，他写道：“袁复礼先生则以五年精力研究博格多山脉及其北坡，对于中生代地层、地质构造及冰川地形都有重要贡献，而天山恐龙之发现，更是举世震惊”。鉴于袁复礼先生等老前辈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在 1982 年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首届年会开幕式上，当时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的黄老在致贺词时说：研究地质学史，总是要研究人，研究他们的成就，对人和成就进行历史分析，还要写传记文章。黄老还特别提出要“抢救历史材料”。他语重心长地说：袁复礼先生已经 89 岁了，还有朱庭祜老先生，他们脑子里有许多活史料。今年春节我去看望袁复礼先生，虽然他手腿不灵便了，但头脑还清醒，记得许多事情。建议武汉地质学院研究生部有一位中年干部，经常找他谈谈，记录下来。我们正是通过黄老的这一教导，和黄老、尹老等地质界前辈在袁老 90 诞辰庆祝会上的讲话，才对袁老的成就和品德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注意较系统地搜集有关袁老的史料，经常向袁老求教，请他讲述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情况及其有关人物的史料，才体会到袁老真是一位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史的开拓者和见证人之一，黄老的指示是多么及时，多么重要。

(杨光荣据随访记录和有关资料整理)

袁老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地学家

李宪之^①

(北京大学)

今年是袁复礼教授诞辰 100 周年，作为他的学生和相处了几十年的同事，虽然年纪大了，而袁老的音容笑貌和他的为人处事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袁老师是个好人，是个非常好的人！他的学识，他的品德我都非常佩服。

我第一次同袁老师接触，是 1927 年春天。有一天，在北京大学二院的布告牌上看到一个布告，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招考学生赴新疆进行科学考察，同学们看了都很兴奋，不少人报名参加考试。主持考试的就是清华大学的袁复礼教授，要考物理、数学和英语。口试时，袁老师用英语问我为什么要到西北去考察？为什么要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我也用英语回答说：大西北非常神秘，资源很丰富，为了开发西北的资源，我愿意去参加考察。最后录取了 4 个同学，有由北大转北洋大学学工程的毕业生崔鹤峰，北京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马叶谦、一年级学生刘衍准和我。我当时是物理系二年级的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在北大读书了，和同学商量好准备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考上了西北考察团，我当然十分高兴。录取了就给我们备装，因为是去大西北，给我们做了皮衣、皮裤、皮帽，连被褥和鞋袜都是皮的。准备时间很紧张，同学们也来帮忙。袁老师在北大兼课，从清华坐人力车到北大的路上，几次见到我都十分关心地问去西北的准备情况，带什么书，带那些东西，对外国人应该抱什么态度，对我帮助很大。我们出发前，文化教育界和地质调查所等单位举办了送别宴会，文化界的许多名人，包括刘半农、袁老师的弟弟袁同礼等名教授出席了宴会，袁同礼担任翻译。北大也举行了送别会，代校长余文灿在会上对我们倍加鼓励，说中国青年应该有所作为，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的能力和智慧。两次会袁复礼教授都参加了，他是中国参加西北考察团的两教授之一，格外受到大家的敬重。

1927 年 5 月 9 日，我们 4 个学生和中外考察团成员，由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和瑞典方面的团长斯文赫定带领从西直门车站出发赴包头，袁老师因事晚走两天。搭考察团专车去包头的还有北大李四光教授和 5 名地质系学生(黄汲清、朱森、李春昱、杨曾威及 1 名日本学生)。在火车上，李先生给我们讲这讲那，但我们听不太懂。在北大校园里，我们常在路上碰到李先生，这次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们都非常兴奋。5 月 10 日晚，大队到达包头，袁老师 13 日到。

去新疆的路上，在包头的北边工作了两个多月，我同袁老师常在一起，考察团分

^①李宪之：教授，气象学，曾任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北京气象学会理事长。

为南队、北队和中队 3 个分队，我在中队，袁老师在南队，我们的工作有分有合。我随德国气象学家赫德(Haude)到哈密筹建气象台，当地政府误认为我们是冯玉祥派来攻打新疆的军队，多方拦截，并把我们从哈密送往乌鲁木齐。后来到若羌建立了气象台，一年后回到乌鲁木齐，又和袁老师在一起工作和学习。袁老师性格稳重，遇事不慌不忙，既有耐性，又很灵活，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很好。他主动帮助徐炳昶团长做了好多事情，出了许多主意。和当地人打交道，也常由袁老师出面。他英语好，在同外国团员交往中，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跟年轻人也处得很好，生活上照顾我们很周到，吃西餐时教我们如何使刀子、叉子；工作之余，教我们唱英文歌，跟我们一起跳舞，他还爱给大家讲笑话。袁老师是个乐观主义者，和他在一起，就不觉得苦，就不感到累。他知识面很广，我们问他什么问题都能回答。给我们几个搞气象的年轻人指出研究方向，他说：气象、气候、海洋、大气物理、海洋学这些方面都是地球科学研究的问题，国内还没有人研究，还有地震、地磁也没有人研究，你们都可以研究。对我们在工作中注意多方面收集资料，为后来选定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启发。

袁老师在新疆去的地方很多，研究的方面很广，而且都有重要发现。除了在古生物方面发现了大量大型脊椎动物化石，在考古方面发掘了许多重要文物外，爬天山，他测量雪线高度，去天池，他测水深，见到怪石，他和新疆的冰川联系起来观察，他什么都看，什么都搞，我们对他十分佩服。所以在整个考察团里，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所取得的成绩总起来，袁复礼教授是第一。他做了最好的工作，取得了最好的成绩，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他的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也使大家非常佩服，艰苦的地方、危险的地区他争着去，别人不愿干的工作他去干。他在新疆连续工作 5 年没回家，家里有困难希望他回京一次，他却风趣地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袁老师不仅学问好，思想作风也很好，当时对我们年轻人影响很大。

1930 年我去德国留学，1936 年回国到清华地学系教书，又同袁老师在一起。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我和袁老师都在地质、地理、气象系，常与袁老师交谈工作，得到很多指导。我每天上下班都要从袁老师家门前过，并经常到他家玩。对我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生活上都给了很多帮助。抗战时期师生们的生活都很苦，有名望的教授、外籍教授都一样。袁老师在西南联大也是有名望的教授，他家孩子多，生活也很苦。在国民党做官的亲戚卫立煌先生送给他家一些大米，他分给许多有困难的老师，给我们家也送了一大袋。袁老师还有好多地方都给我们不少帮助，他的为人真叫人佩服，没有过这么好的人！有件事情我和我的夫人永远也忘不了。那是 1946 年我们从昆明回到北京清华园，记得当时是 11 月末，天气冷了，家中什么也没有，我们全家七口人都在袁老师家吃饭。有天吃早点，孩子的稀饭喝不了，我夫人叫他喝完不要浪费，可孩子小，他怎么也不愿喝。袁老师把它拿过来，把剩下的稀饭自己喝了。我夫人见此情景，感动得要哭，后来她常提到这件事。袁老师就是这样，待朋友胜过亲人，这些非常动人的事，我始终也忘不了。

清华地学系、西南联大地学系，培养了不少地学人才，袁老师是有很大功劳的。袁老是一位给国家和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杨光荣根据访问纪录整理)

要象袁复礼先生那样做人

贾兰坡^①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袁先生为人忠实厚道、勤于工作、胸怀坦白、平易近人，从不拿别人的成果作为自己的发家“本钱”。他的为人，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他 1921 年归国后，到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当年即和瑞典学者安特生联袂前往仰韶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据说，当时中央地质调查所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史前时期的材料归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历史时期的材料归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安阳殷墟的发掘就是由后者进行的。所以说，袁先生不仅是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教育家，又是考古学家。在中国人中他是参加史前考古发掘的第一人。

1953 年，周明镇先生将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择义先生从晋南襄汾县丁村砂层中采到的一些打制石器带回北京。杨钟健所长认识到这批材料的重要性，在新生代研究室旧址——北京地安门外二道桥，邀请袁复礼、夏鼐、裴文中、周明镇、安志敏诸先生和我，参加了对丁村是否值得发掘的审核会议。大家都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材料，应该前往发掘。杨先生只用 14 个字作了总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这几位先生的支持下，才由我组队于 1954 年前往丁村发掘。工作结束回到北京之后，杨钟健先生又召开一次有袁先生参加的会议。由我报告发掘的成果，得到大家的赞许。记得袁先生见到三棱大尖状器，还开玩笑地说，“这是‘飞镖’，黄天霸使用‘金镖’，丁村人使用更大的‘石镖’，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袁先生在参加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期间，发现了不少的打制石器。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属于“细石器”类型的船形石核、棱柱状石核、锥形(即铅笔头形)石核，以及被截断两端的薄而窄长的小石叶等。现在我们研究所尚存有他赠给的这类材料。在每块材料上都注有“银根”二字。但“银根”在何处，还没有人知道。30 年代中期，我和裴文中先生曾到清华大学地学系拜访过袁先生，目的是想弄清“银根”的具体所在。可惜袁先生也记不清它们的确实地点，只恍惚记得是在宁夏或绥远北部。我曾多次到内蒙旅行，也曾经向蒙族朋友询问“银根”地点。原来“银根”是蒙语，意为“石磨”，我也曾到过有石磨的地方，但只有石磨盘放在那里，附近既无人烟，地表上也无石器可寻。

^①贾兰坡：学部委员、研究员，古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

现在，“细石器”的发现愈来愈多了，广泛分布于中国北部的高原和草原地区；其最南界可达到四川省雅安。目前“细石器”虽然在中国北部很容易发现，但是在 20 年代末期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绝非易事，因为当时人们对这项材料的分布和打制技术，还都不甚了解。

袁先生在西北地区是最早发现“细石器”者之一，随后又有更多的发现，才会有后来的迅速发展。德日进就是根据新疆吐鲁番附近、哈尔滨附近和阿拉斯加的同类型细石器的发现，才在 1939—1940 年发表了《新石器时代黎明期亚美二洲文化之关系》一文(《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袁先生和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后改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来往很频繁。他不仅和杨钟健先生合作研究他在新疆发现的二齿兽和恐龙化石，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材料也特别关心。我们有重要考古材料，常请他来看，并听取他的意见。

1928 年，韩雷(C.M.Heanley)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上发表了《香港石器》一文；同年袁复礼先生根据韩雷先生的发现又写了《香港新石器之研究》一文，发表在同一刊物上。他们的发现和研究为后来香港史前文化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由于袁先生对人处事大公无私，敢说敢当，我们研究所有事经常请他来帮忙。我记得我和周明镇先生在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时，职务都是技士；当我们的新生代研究室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后，把我们俩改为副研究员，于 50 年代又同时晋升为研究员。为我们召开的评审会，就有袁复礼先生参加，同时参加的还有童第周、夏鼐、杨钟健(主持人)、裴文中等人。

1921 年安特生和袁复礼先生共同发掘的仰韶文化，因为首先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城北仰韶村而得名。我记得 1953 年，由裴文中先生带队，有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择义和我们研究室的周明镇、孙艾玲等先生和我参加的考察队，为了解那一带的含哺乳动物化石的堆积层，曾顺便参观了仰韶新石器时代遗址。走到那个村子的附近，就见到遍地是陶片，偶尔也会捡到彩陶片、打制成的石器荒坯和磨制的石器 etc。当我们登上一个土坡，平地上有一片树林。林中拱立着一座石碑。石碑记载了仰韶遗址的发掘情况。当时我曾把碑文录了下来，现已经过 40 年之久，未能找到抄录的碑文，不知目前该碑是否还保存？由于当地人不了解中瑞合作考古的内幕，把袁复礼先生说成是“翻译官”。实际上袁先生是作为中国学者，和安特生一起到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袁先生在当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安特生在他写的文章中也肯定了袁先生的工作。听袁先生说，安特生不是经常在发掘现场，发掘工作常常就由他指导进行，发掘现场的地形图也是由他测绘的。那块石碑虽然写错了，但证明袁先生是参加了。

袁先生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史上经历的时间最长，参加的工作很多很广，知道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有什么问题就常去问他；那篇文章上有搞不清楚的地方，一找袁老先生，他就会告诉你。大家喜欢找他，还因为他肯帮助人，而且对谁都一样。所以，我们不仅要学习他怎么做学问，更要象他那样做人。

淡薄名利宽厚待人的长者

——深切怀念袁复礼教授

孙殿卿^①

(地矿部地质力学研究所)

袁复礼教授是我国地质界的前辈之一，他毕生从事地质教育事业和地质研究工作。尤其是在地质教育战线上，他辛勤奋战，默默耕耘了60余年，培养出一大批地质干才，桃李遍及祖国各方，硕果累累，为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袁老一生从事地质教育与研究工作，涉及的范围极广，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执着追寻科学真理，是吾辈学习的楷模。

袁老除区域地质、古生物地层及第四纪地质外，他是中国人研究现代冰川的先驱。早在60年代，由李四光教授召集的《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中心联络组》会议，除袁老应邀参加外，李捷、杨钟健、尹赞勋、俞建章等老一辈地质学家也应邀到会。会议内容着重研讨第四纪冰川遗迹工作如何在中国开展的问题。自此，我与袁老过从较多，关系日趋密切。

回顾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发现是在20年代初由李四光教授在山西大同盆地及太行山东麓发现并公诸于世的，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之后于30年代至80年代，在悠悠长达50年当中，先后在庐山、九华、黄山、继而在鄂西、黔东、桂北、云南、川西以及中国东部广大山区均发现了确凿的第四纪冰川遗迹。

《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中心联络组》会议曾共同商讨选定若干地区进行详细考察并追索冰川遗迹的分类、分布以及亚冰期的划分。在研讨有关冰川遗迹问题时，袁老和与会的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通过数十年来广大地质、地理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丰硕成果，也有力地证实了中国第四纪冰期的存在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见《第四纪研究》1989(4)“中国第四纪亚冰期划分之商讨”附表)

袁老一生淡薄名利，平易近人，待人宽厚，温和可亲，是我敬重的长者。时值袁老百年诞辰，谨此以志缅怀。

^①孙殿卿：学部委员、研究员，地质力学、大地构造学，原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现任地矿部地质力学所名誉所长。

袁老师的教诲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程裕淇^①

(中国地质科学院)

1932年从新疆考察回来的袁复礼老师，当年秋季任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我是受他培养的第一批地质组毕业生。我亲受他的教诲虽只开始于1932到1933这一学年，但在1929年秋季初入清华时，就已知道我们系（当时是地理系，后改称地学系，分设地质、地理、气象3个组）里有一位远在新疆进行实地地质考察的地质教授袁复礼先生。在以后3年中，渐次了解到他怎样长期坚持艰苦、扎实的野外工作，早期在新疆和在甘肃发现和系统采集了早石炭世与二叠、三叠纪化石并作出了有关地层学和地质学方面的贡献，体会到没有认真而细致的野外地质调查就不可能有相应的地质科学上的成就。这在一个初跨地学门槛大学生的学术心灵上留下了一个十分鲜明的烙印，因而在我还未见他以前，已经间接受到他的春风化雨影响。通过此后他对我的言传身教，我更进一步以重视野外地质工作、密切地质工作中野外和室内的紧密结合为我从事地质工作的座右铭。纪念袁老师诞辰100周年，我们首先要宣扬和学习他所树立的重视野外地质工作的榜样，纠正过去一段时间内不少地质科研和教学单位甚至有些基层地质队，在工作中忽视必要的野外调查研究的偏向。尤其是有些机构相当一部分的年轻同志，只愿在室内或不愿做扎实的野外地质工作，或只采一些数量不足且不一定有代表性的标本、样品，就热衷于做一些高、精、尖的测试，同国外的有关图表曲线做比较。由于野外时间短，工作不扎实，致使室内数据难以确切联系客观实际，空有其表而在实质上没有合理阐明自然现象或取得一些理性认识。如不大声疾呼，扭转这种不正的学风，难免将有更多质量低劣的地质成果出现。

袁老师学有专长而知识渊博，科学基础深厚。他是我国地貌和第四纪学科的创始人。他在67年的地质实践中所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其长期教育生涯中开设课程之多，更为罕见。因而他对错综复杂的地质现象和问题，能窥探各方面因素的内在联系，进行全面综合分析，找出它的关键所在，对多方面的现象提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解释，并对问题提出较为合理的解决意见。针对近40年来我国地质院校的学科、专业组划分过细，毕业学生基础科学知识和基本地质科学知识不够深广，而进入社会后的岗位工作又往往过于机械划分，因而影响到业务造就方面可能达到的精、专、深的程度，同时也容易导致对科学技术问题作出片面或机械唯物的结论的情况。

^①程裕淇：学部委员、研究员，岩石学，原地矿部副部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现任地矿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国际岩石圈计划中国委员会主席。

看来我们也十分必要对袁老师在这方面的业绩广为传播，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以促成通过改进的院校专业设置和教学大纲并在学生毕业后的地质实践中，培养出大量一专多能和善于采用综合科学技术途径来解决一些高、精、尖地质课题的科技梯队，以及能领导中国地质科技事业不断前进并取得成就的专家队伍。

他的教学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他不采取填鸭式，而是抓纲要，讲要点，强调启发，引导学生博览群书，自我完善对问题本质的认识，使他们既了解前人理性认识的精华，也注意其不足和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如我在四年级学习袁老师讲的《高等地貌学》，涉及到海洋地质作用时，他就把美国地貌学家 D.Johnson 的《海岸作用和海岸线发育》那本书的要点讲了，再提出一些问题的提纲，就让我们同班 5 个同学“分工”阅读有关章节，再交流各自的读书心得，并讨论提出的问题。这样我们以略多于阅读全书 1/5 的时间，就基本上掌握那本书的要点，同时还锻炼了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而就整个课程来讲，我们所学到的也远远超过了每周几个钟点的教学内容。

以上是我从 61 年前开始作为一个学生受袁老师言传身教教海的几点体会。这一深刻教育，对我这个走出校门已从事地质工作 60 年的老学生来说，所起的作用确是很大。我前后带的研究生虽不多，但都到过他们进行野外研究的地区，共同观察自然现象，讨论有关问题。这也算是袁老师重视野外地质工作的教导在我行动上有所反映的一个侧面。

袁老师的许多长处，我作为学生，还远远没有学到，今后要进一步把他的工作精神带到实践中去。

热爱地球科学追求真知的教授

——记袁老师二三事

曹国权^①

(山东省地质矿产局)

在蜿蜒于湘黔山区的公路上，1938年2、3月间，经常有三五成群穿着褪了色的黄制服的学生，由东向西结队而行。在这些学生中，常可看见袁复礼及闻一多先生。这是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1937年10月在长沙组成的临时大学，完成下半年学业之后，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迁徙队伍。

我初次见到袁复礼先生，是在长沙临时大学借用的圣经学校里上课的时候，当时，在我眼前，讲台上站着一个身体魁梧，面孔严肃，目光深邃而说话低沉的教授。从高年级学生口中，才知道他是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代理团长，心中油然而产生一种敬佩心情。

1937年秋，学校当局感到长沙市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仍然有失落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手中的危险，决定远迁到云南首府昆明建校。学校于1938年春节后发出迁校公告，学生可自费从香港河内河口转昆明，也可参加由学校组织的步行团，经贵阳去昆明。如果参加步行，就得每天徒步沿公路走二、三十公里，晓行夜宿，前后要花40余天，才能走完近1700公里旅程。这是很艰苦的迁移，住的是农村民房，阴暗潮湿，睡地铺，中午啃馒头吃咸菜，年轻人可以承受得住，对年近50岁的袁先生，就是一场考验。袁先生为何不走香港——河内那条舒适路线呢？在长途跋涉中，我才发现袁先生手提地质锤，腰系罗盘，对沿途岩石露头很感兴趣，而且有时，在小本上记录地质现象，素描露头。他不绕行香港、河内，原来是借步行迁徙这个机会，趁此考察湘黔一带地层、构造，视步行为乐事。这是什么胸怀，这是一种热爱地质科学，追求真理，以苦为乐的科学家胸怀。有时，袁先生俯身打石头作观察时，我凑上去观看，有一些难以命名的岩石，就此向他请教。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这些岩石名称，大致的生成时代，高兴起来，还谈到湘西有名的汞矿等。我这二年一期知识浅薄的学生，似懂非懂地仔细听着，只是‘嗯’‘嗯’回答而已。

昆明，这个美丽、宁静被誉为小北京的城市，外来单位越来越多，逐渐热闹起来，物价也日益飞涨，教师学生生活日趋困难。有一年(1939?)，学生们谈论一件事，有人看见一位教授，扛着一布袋几十斤重大米，在街上艰辛地行走。“为斗米折腰”的情景，竟在30年代末期出现了，大家又感慨又气愤。我探问是那位教授，最后

^①曹国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区域地质、矿产普查，原山东地矿局总工程师，山东地质学会理事长。

才知道是曾经留学美国，在学术上深有造诣的袁复礼先生。虽有失教授尊严，却又不得不在货币贬值，生活艰苦情况下，被迫面对残酷的现实，形成“斯文扫地”的局面。这是日寇进犯的结果，也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控诉。

昆明城外西北角一大片土地，包括借用的云南师范在内，是西南联大教学生活基地。在这里出现了成行成列茅屋顶竹篱笆墙结构的简易教室，外敷黄泥白粉，井然有序，很是壮观，这就是我们的教室。袁老教我们构造地质学。一次，讲石油储油构造，他联系到石油公司之间边界纠纷，说“油的流动受地质构造控制，是不受地面边界制约的，哪个公司先动手抽油，它就能多争到石油”。这样，学生就有生油层与储油层两种不同概念，学生也知道了广大平原之下，隐伏了鼻状构造和背斜构造、断层构造等等，学生也领悟了地球物理探矿如人工地震对找油的重要性，这些都是通过石油企业勾心斗角的纠纷而演绎出来的。他并不是简单的描述一些构造名词，却有趣而生动地谈出许多重要原理。丰富的工作经历和高度学术理论水平，是这种教学方法的重要基础。

袁老讲课的又一特点，是由此及彼，引伸到一些教科书没有写进去，但又是地质工作者需要的知识。他从认识地质构造讲到找油，讲到钻探工作。他解释钻探中套管的作用，在黑板上写了 Casing 这个字，并说如何防止缩径。这些事，对我来说，都是很新鲜的。套管这个英文字犹历历在目。是他，拓宽了青年学生的知识领域，是他，将枯燥乏味的地质概念说活了，变成饶有兴趣现实的东西。

星移斗转，岁月如流，从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这一学习阶段，到现在已 50 多年了。我怀念袁复礼老师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怀念他那知识渊博孜孜以求的进取献身精神，怀念他那善于联系实际谆谆诱导的教学方法。在老师袁复礼教授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将我个人能记忆到的几件事，写成文字，聊以作为纪念。

随袁希渊老师在四川工作

苏良赫^①

(中国地质大学)

希渊老师朋友很多，交游甚广。即使在昆明期间，也常有人向他请教，请他帮助解决问题。作为老师的助手，我曾和他一道去四川工作过，后来又随他在叙永分校授课，前后在四川共约一年。

一、去重庆勘查煤矿

1940年暑假期间希渊老师受人邀请须去重庆一行。按照那时规定，教授可以乘飞机出差而助教只能坐汽车，从公路往返，希渊师嘱我先乘车离昆明，经贵阳，再去重庆。他自己随后乘飞机直飞重庆。那年清华同学刘乃隆兄才毕业。我2人结伴一同由昆明到贵阳。到贵阳后，乃隆去了江西，我自己换车去重庆。

在那个年代，重庆常受日本飞机轰炸，而长江南岸的海棠溪没有被日机轰炸过。家住重庆的达官贵人们纷纷在南岸找一存身之所。因此南岸的住房和旅舍都满满的，租出去了，很难找到一处空房。我带着行李是清晨到达海棠溪的，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一家四层楼的旅馆，在四层楼上的晒台上有一间小屋还空着，可以租给我。不过旅馆中的人警告我说，太阳出来后这间屋子里热得要命，没有人受得了，所以才空出，没有人愿意租。我说我租它只是为了存存随身携带的东西，我立即空身过江去，不在这间房内住宿。

我过江到了重庆市區，找到在重庆工作的家兄，就住在他那里。此后日本飞机连续3天的轰炸，我们不时须要躲进防空洞。到了第4天，才有机会去海棠溪取回寄存的行李。以上是当时我到重庆后，而希渊师尚未到重庆前的情况。

希渊师到了重庆，我随他去山洞工作。山洞是重庆歌乐山附近的一个专用地名。(解放后才知道，国民党那时关押着好多革命同志的渣滓洞和白公馆就在距离山洞不远的地方。可惜我们全然不知道!)山洞有一个煤矿。我们被邀是勘查那个煤矿。煤矿的地质情况比较简单，我们用了不足一个星期的时间，工作就完成了。

重庆的任务完成之后，希渊师又乘飞机回昆明了。我还是要走公路。重庆去昆明的旅客很多，乘长途汽车须要排队，要两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在等候汽车的时间，

^①苏良赫：教授，工艺岩石学，原北京地质学院博物馆馆长、中国硅酸盐学会工艺岩石专业委员会主任。

为了躲开重庆，少受跑防空洞之苦，我和清华高班同学王钟山兄同去北碚躲避。彼时气象研究所在北碚，清华高班同学么枕生兄在那工作。我们去到他那里，他给我一个带蚊帐的床，供我休息。

北碚疟蚊很多。虽然我睡眠有蚊帐，还是被疟蚊钉咬了，得了恶性疟疾。返回重庆后，由于患病，头脑终日昏昏沉沉，不能乘汽车回昆明了！不得已留在重庆，治病和养病。

治病和养病期间，日机轰炸仍然不停，而且非常厉害。重庆的大梁子就是那时炸平的。我身患疟疾，还得跑防空洞，非常痛苦！

过了秋季，进入冬季，我的疟疾渐好。我写信给希渊师说作回昆明打算，希渊师回信说不要回昆明了，叫我留在重庆等候，他自己也要带全家到重庆来了。

二、到叙永西南联大分校

1940年的国际形势变得对中国越发不利了。日本侵略者攻占了安南(越南独立前之名)，昆明的形势紧张！西南联合大学几度开会讨论迁校问题。地点几经选择，11月份决定先在四川南部叙永县设一分校，搬去一部分，招收一年级新生，以备万一。分校师资则遴选著名教师担任。分校主任、分校校务委员及分校各门主要任课教师都是如此，袁复礼教授被选派担任分校地质学教授，我则仍为助教。

将近新年，希渊师全家，袁师母和六位弟妹来到重庆。稍事休息，他们全家和我一同乘长江轮船溯江上行到纳溪。在纳溪上岸，换乘汽车抵达叙永县。

叙永县位于长江的一个支流安宁河上。安宁河自南向北流，在纳溪入长江。叙永县是安宁河的航运尽头。由叙永向北，小船可以通航。由叙永向南，安宁河坡度过陡，河水湍急，舟楫无法通行。

叙永又是“双城”。河东和河西两座城，由“上桥”及“下桥”两座桥联结在一起。叙永是川南的一个重要县城，它是从四川向南通往贵州以至云南必经之县。

叙永城内庙宇不少，西南联大就是利用这些庙宇的空房开展教学的。分校有教师数十人，学生，包括大学一年级学生及先修班学生共600多人。这些人主要是利用好几处分散在东城和西城庙宇做为宿舍及教室的。1941年1月10日分校才正式开学。开出大学一年级各系的全部课程。希渊老师的普通地质学上课同学近百人，其中包括主修地学系的同学，更多的是主修其它院系，而选修地质学的学生。

抗日战争期间，上课时教科书困难，在叙永分校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虽然分校也有图书馆，但是那里的可读书籍少得可怜！讲课全凭教师口授，学生记笔记。学生入学的程度参差不齐。程度好的学生多半来自沦陷区有名的中学毕业生。他们笔记记得快，理解能力强，学习成绩自然好。有的学生来自内地小县城，还不习惯用钢笔记笔记。教师已经开讲，他那里才磨墨，用毛笔记笔记，自然远远跟不上讲课的速度，希渊老师班上就有这样的学生，学习非常吃力！课后讨论中，学生发问，有的问题也很可笑。例如有人问如何可以使不同地质时期的古生物统统复生，我们就可以开辟一个古今的动物园！

西南联大实行“学年制兼学分制”。希渊老师除去自己讲授地质学课程之外，还负